

● 徐梁伯

# 民国风云中的孙科

在风光绮丽、贯通四海、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有一个当今世界闻名的小村——翠亨村，在这小村的一所坐西向东的普通农舍里，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大总统孙中山，25年后（即1891年）的10月20日，又诞生了这位大总统的哲嗣——孙科。他长大后成为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对民国社会的经济、财政、法制、外交等方面的建设颇有影响。

## · 飘泊中的青少年时代

孙科，字哲生，为孙中山原配卢慕贞所生。同胞姐妹尚有长妹金琰（孙琰）、次妹金琬（孙琬）。孙科出生后的次年，由于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至澳门镜湖医院任职，因此随母暂住澳门。旋因孙中山离开澳门，至广州开设中西药局，开始秘密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孙科母子被安置香港定居。1895年冬孙中山领导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为家属安全计，托同乡陆灿将孙科母子、祖母及金琰护送至檀香山长兄孙眉处。孙眉当时在茂宜岛经营一个很大的牧场，颇为富有。孙科在伯父处初随母习读《三字经》、《千字文》和《唐诗三百

首》之类的启蒙读物，到7岁时才延聘了一位姓黄名瑞祥的同乡塾师，教习“四书五经”一类的中国古书，打下了良好的中文基础。为了进入当地的正规学校，继续学习，因此寄住友人家中，入当地罗马天主教会所办的圣安东尼奥学堂就读。从此孙科开始接受系统的西方文化教育。由于他天资聪颖，十分用功，所以成绩特别优秀，八年制的课程，只读了四年就全部修完毕业。1906年，孙科考入檀香山圣·路易士学院。开始寄居兴中会会员郑金、郑照家中。不久因路远不便，在该校寄宿。在校期间，年青的孙科，开始对政治发生浓烈的兴趣。1910年3月，孙中山到檀香山继续鼓吹革命，准备为发动起义筹集经费。同时，将檀香山兴中会改组为中国同盟会分会。当时20岁的孙科对父亲的革命活动深切关心，“决意献身革命”，在这次会上正式加入同盟会。他虽然还是学生，但每天都要阅读英文报纸，关心国际国内的政治变化。同时担任《自由新报》、《大声周刊》的记者、编辑，宣传革命。1911年孙科从学校毕业。当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因此将他接去，由友人蒋梦麟照顾拟入加州大学读书。由于加大入学条件极严，除一般课程外，学生还必须

懂德、法、拉丁、希腊四种语言文字，孙科不得不拼命补习外语，同时还参加当地华侨创办的《少年中国晨报》工作。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孙科积极参与海外宣传，到处演讲，宣传辛亥革命，学业暂时中断。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孙科应召回国，稍后，母亲卢慕贞和两个妹妹、堂姐也一起来到南京。多年分离，斯时全家得以团聚，住在南京原太平天国天王府西花园东北角的一处简陋的两层楼瓦房内。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举家西上武昌，旋归上海，再南下闽粤。7月孙科和两个妹妹被安排去美国继续求学。孙科途经檀香山时与早时恋人陈淑英结缡，时年22岁。8月孙科参加加州大学入学考试，在友人的帮助下，将最难学的希腊文改试中文，全部顺利通过。

1913年9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南京发动二次革命失败，大批流亡美国，孙科参加了他们的宣传演讲接待等工作。1916年5月孙科加大毕业，9月又考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主修政治、经济、理财，选修新闻，并和革命党人创办《民气报》，主笔国际问题社论。1917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孙科在两校学习期间，根据父

亲“文科与理科并重”的要求，修完大量的文理科基础课程；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同时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这为他日后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各种要职，并均有出色的建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三任广州市长

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称帝病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订的《临时约法》遭到了无情的破坏和践踏。为此，孙中山又继续领导了护法运动。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召集南下议员在广州举行“非常国会”成立护法军政府，被推选为大元帅。8月孙科回国，担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兼外交部秘书。1918年桂系军阀进入广东，莫荣新当上了广东省督军，孤立军政府控制政局，排挤孙中山。6月，孙中山愤然离粤去沪。孙科留在广东与友人黄宪绍创办英文《广州时报》，担任副主编，主笔国内新闻。同时，往来香港、澳门、上海之间，筹设革命机关，募集经费，1920年去香港。

当时的军阀混战，风云变幻。1920年陈炯明部粤军赶走了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帮助孙中山

重新控制了广东。11月孙中山任命陈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为讨好孙中山，陈委任孙科为广州市政厅长兼治河督办。不久，广州改建制为市，孙科又被委任为市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广州市第一任市长。为了制订较为规范的近代都市市政条例，他“穷一夜之力，草拟完成”《广州市暂行条例》57条。按条例规定：“市政府以下，分设公安、工务、财政、教育、卫生及公用六局”，其中“公安”、“公用”二局名称为孙科首创，一直沿用整个民国时期。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公开背叛，炮轰总统府及观音山粤秀楼总统寓所，孙中山被迫撤离，登永丰舰指挥平叛。孙科受命去港，再次在华侨中筹措革命经费百余万元，以应军需。平叛历经两月，艰危备至，终因势单力薄未能奏效。孙中山不得不再度离粤赴沪，于8月15日发表宣言，声讨陈炯明。

1923年1月，滇、桂联盟的讨逆军攻入广州，陈炯明率部败退惠州，孙科复任广州市长职。2月，孙中山离沪回广州，“设立大本营，续行大元帅职权”。10月设立改组国民党的执行机构——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孙科为九委员之一。委员会负责起草党纲，办理各地党员登

记，为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准备。孙科在此期间，主要负责筹措革命经费。1924年秋，广东形势趋于稳定，孙中山决定联络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南北夹击，讨伐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以完成北伐大业，遂命孙科前往东北与奉张谈判，广州市长另委伍朝枢接任。不久，奉军进入山海关，直逼天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曹锟，并急切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13日偕夫人宋庆龄及随员由海路北上。孙科亦由沈阳抵津迎接。12月4日孙中山南抵天津，肝病即发作。为方便治疗，月底由津赴京，直到1925年3月12日逝世，一直由孙科随侍在侧，及至办完公祭，移灵香山碧云寺后，孙科始回到上海小憩，6月即到广州。时值国民党人蕴酿成立广州国民政府，孙科荐选为政府委员。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孙科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5月广州市长伍朝枢去职，孙科补市长缺。是为第三次主持广州市政，并兼广东省政府委员暨建设厅长。

孙科三次主政广州，初创广州市制，建立市政府，实行近代城市的规范管理，开辟财源，进行市政建设，对支持革命，实现北伐起了重要作用。此前的广州，原是珠江

口的一个破烂旧城，市容杂乱、肮脏，市政管理混乱，捐税繁多，很不利于经济发展。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孙科悉心筹划，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搜罗人才，委以重任。大胆地启用吴铁城、林逸民、李奉藻、司徒朝等一批留学生、专家。二是科学规划，整顿市容。他决定拆除双门底重门、南城、西城、东城，先后建成惠爱路、太平路等主要交通干道，排除了水患，将住宅区与商业区连成一片，彻底改变了市容、交通面貌。三是整顿税务，开辟财源。

### 对民国政制建树良多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再次兴师北伐，谋求全国统一。蒋介石为北伐军总司令。9月初北伐军攻克武汉，11月国民党中央决定将广州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武汉。孙科时任广州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兼广东省建设厅长、广州市长、市党部组织部长等职，奉命先期到达武汉。12月13日，在武汉成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代行党和政府的最高职权，孙科为中执会常务委员及临时联席会议主席团成员。可是蒋介石妄图以军制党控制国民政府最

高领导权，始则积极主张迁都武汉，后又出尔反尔“力主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对此，孙科明确提出反对意见。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选出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委员9人，中央政治委员15人，中央党部各部长8人，军委会委员16人，国民政府委员28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5人。孙科为各委员会成员，同时兼任青年部部长。初期的武汉国民政府由于坚持国共合作，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充分表现了它的进步性，工农运动因此获迅猛发展。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在南京另立中央，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形成宁汉对峙局面。与此同时国民党中的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也另立中央。随着工农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武汉国民党中央开始分化，孙科与汪精卫、谭延闿等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分共。并与朱培德、李宗仁、胡汉民、张继等先后在九江、南京、上海召开会议，经酝酿，最后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孙科为委员之一），结束宁、汉、沪三党部的对立，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孙科任财政部长，1928年1月3日改任建设部长。旋奉外交委员会令，与

胡汉民、伍朝枢赴中东、近东、欧洲考察各国政治、经济情况，以为建国借鉴。行前与其他委员一起建议设立“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专门负责规划国家政治制度之建设。6月，国民党军进入北京，南北统一。时孙科等率考察团正在巴黎，得此消息十分兴奋。大家建议未来政府可试行五院制，并由孙科起草《党国训政大纲》、《应付外交方法草案》，集体讨论商定完稿后电呈国民党中央。经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分送第五次中央全会及国民党政府参酌办理。不久，孙科又奉命去美聘请财政专家为国民党政府顾问。9月由美回国，参加起草《五院组织法》、《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国国民党训政大纲》，于10月3日获中常会讨论通过。8日，中常会议决由蒋介石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孙科被任命为考试院副院长兼铁道部长和交通大学校长。11月间拟就《铁道部组织法草案》呈中央通过，付诸实施。对军阀混战后铁路恢复通车，收回日军占领的胶济线，将粤汉路收归国有，以及全国铁路的养护展筑、待建路线的勘探等工作，均多有贡献。同时建议利用庚子赔款，充裕铁路建设经费，重点建设陇海铁路，使之提前通车。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中国第

一家民航公司，亲任董事长，并亲自乘坐手摇发动的螺旋桨小飞机与驾驶员二人冒险飞行，开辟沪宁航线，最后降落在南京城内明故宫大校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不断扩大对华侵略，孙科于1932年3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确定长期抗日方针案》；4月又在上海《时报》上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12月在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1936年7月，又提出《请迅速改革租佃制度，以实现耕者有其田案》；1939年1月，提出《巩固前方经济基础方案》。这些文件反映了孙科坚持“集中国力”、“长期抗日”的正确观点，对促进朝野人士团结抗日，共赴国难树立信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2年12月孙科任立法院院长，为国民党政府的法制建设做了不少工作。首先是在宪政建设方面，集中专家40余人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由张知本负责，起草宪法初稿。旋由吴经熊斟酌损益，广泛征求意见。最后形成《宪法草案初稿》，至1934年10月三读通过，成为“立法院第一次宪法草案”，送国民党中央审查修改通过，于1935年5月5日公布。是为《中华民国宪法

草案》，又称“五五宪草”。其次是在一般立法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经过数年的努力，民国法制建设规模初具，各种法律基本具备，“不但我们自己觉得满意，就是外国法学家也有良好的批评”。这些立法方面的建树，打破了西方各国借口“中国法律太陈旧、司法制度太腐败，而不允许取消领事裁判权”的局面，“使与司法裁判有关的各种程序和手段，能适合领事裁判权取消以后，外国人受我国法律裁判的需要”。但是在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独裁统治下，孙科主持制订的一些法律形同具文，只能起粉饰门面的作用，并不能达到依法治国的目的。

### 访苏联争取援助

孙科在民国外交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外交关系中十分重视苏联的作用，对苏联一直采取比较友好亲善的态度。由于孙科的努力，争取到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援助，为中国人民坚持长期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作出了贡献。

中苏关系由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一直比较友好。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大肆“清党”，反共反苏；1929年又指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中苏关系开始交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肆侵华，出于外交方面的考虑，国民党政府才开始恢复中苏邦交。孙科对蒋介石“清共而绝苏”的举措十分不满，他认为这是促使日本大胆侵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敌人知道（中国政府）已与其革命过程的唯一与国断绝关系，乃胆敢肆其侵略野心”。为此孙科积极谋划改善中苏关系。他想通过努力，促使中苏两国缔结同盟条约。但由于当时蒋介石对日抱有幻想，并不急于同苏联改善关系。对此，孙科十分着急。1935年夏，张西曼以发展中苏两国邦交为宗旨，发起组织中苏文化协会，遇到阻力。有人建议找孙科帮忙，请他出面主持。孙科欣然支持并应允担任该会会长，同时还举荐当时国民党左派中的一些知名人士如王昆仑、张冲等人担任协会常务理事。并亲自致电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希望得到他们的响应。在孙科的主持下，该协会获得迅速的发展，抗战期间会员发展到5万多人，对发展中苏文化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改善两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蒋介石对日妥协，却遭致日本

的全面侵华。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深感事态严重，将改善中苏关系重新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命孙科和外交部长王宠惠开展对苏外交。在七七事变后的十多天中，孙科三次会见苏驻华全权大使鲍格莫洛夫，敦促中苏合作，缔结同盟条约，给予中国军械援助。苏方对此反应积极。经过协商，很快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为了进一步协商解决苏联对中国的军械援助问题，国民党政府决定孙科以蒋介石特使身份组团访苏，洽借1.5亿美元购买军火。1938年1月17日孙科经欧洲抵达莫斯科。首先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斯托莫尼亚科夫进行了亲切的会谈。孙科认为：中国和苏联应友好相处，以便保障远东和平。斯托莫尼亚科夫表示苏联对中国人民确实充满着同情，热切希望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双方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及两国关系坦诚交换了看法。2月初，斯大林接见孙科，他高度赞扬中国将士和人民抗战的决心和勇气，两人竟从午夜畅谈至凌晨，为中苏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2月21日孙科离开莫斯科去法国巴黎，对法国开展抗战外交活动，争取法国的援助。孙科到法国不久，又接到中国驻苏军事代表杨杰的来电，要他回莫斯科，跟

斯大林商谈第二次军事贷款问题。3月初孙科第二次访问莫斯科并很快得到斯大林的接见。最后斯大林批准给予中国5000万美元的援助。同时再给予中国贷款5000万美元,用于购买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等军械武器,合计1亿美元。而且价格非常低廉,大大低于国际价格。关于苏联给予中国军援会谈的成功,跟孙科的积极活动有很大关系。

1939年春,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困难时期,当时英美法不肯援助中国,苏联成为唯一能争取大宗借款的国家。为了签订中苏商约,争取苏联的第三次借款,孙科奉命第三次出访莫斯科。3月底由重庆出发,坐火车经新疆入苏,4月7日到达莫斯科。由于国际形势的错综复杂,苏联正忙于准备与德国法西斯政权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因此,孙科感到苏联的接待远不如前两次积极热情,数周后才得以谒见斯大林,递交蒋介石给斯大林的信。可是出乎意料,接见后,斯大林十分痛快表示:“苏联极愿照办,没有什么问题。”当即同意再向中国提供1.5亿美元的第三笔贷款。接着商谈正式签订中苏商约的问题,斯大林亦欣然同意,嘱米高扬具体洽谈签约事宜。中苏商约经双方协商共15条,完全体现了平等互惠的原则。孙科

代表中方,米高扬代表苏方,于1939年6月16日在商约文本上签字生效。苏对商约的签订十分重视,6月24日,莫洛托夫为此还专门举行了招待会,庆祝商约的缔结,苏联党政首脑均出席。以后几年间,中苏关系一直比较融洽,这不能不说是孙科在中苏外交方面作出的贡献。

可是到了1944年,盛世才在新疆发动反共反苏的新疆事件,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苏联对此十分不满,中苏关系受到损害,并进而恶化。为此,孙科对盛世才和蒋介石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评。他认为应从长远的战略高度来看待中苏关系,摒弃传统的“远交近攻”的错误外交观点,实行“远交近亲”的外交方针。他说“一定要和苏联亲善,永远保持密切关系,然后中国的复建国,长治久安才有最大的把握”。抗战结束前夕,他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高级班专门作了关于中苏关系的报告,指出“今后我们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就是亲善提携的政策,希望各位同志能确切理解我们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关键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前途,致力中苏邦交之亲善”。孙科的这些主张,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抗战后期的中苏关系的改善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被时人称为亲苏派。可

惜，随着美蒋关系的升温，蒋介石出于反共反苏的立场，最终还是背离了孙科这一正确的对苏外交方针。但孙科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努力改善中苏关系，有利于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其功不可没。

## 主持短命内阁， 晚年移居海外

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举行重庆谈判，议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参加，共商国是。1946年1月7日举行预备会议，各方代表38人，孙科被推为会议主席。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召开。会议通过《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等决议。不久蒋介石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单方面决定宣布召开“国民大会”。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孙科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12月25日正式通过孙科主持制订的《中华民国宪法》，并决定1947年1月1日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该宪法从法律上规定了国会制、责任内阁制以及地方自治等民主权利，表面上结束

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但实际上并未贯彻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且带有维护蒋介石独揽大权的色彩。1947年4月改组“国民政府”，蒋介石为主席，孙科为副主席继续兼任立法院院长。

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动内战，单方面召开“国大”公布宪法改组政府，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他又决定召开“行宪国大”，11月委派孙科为“国民大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在“国大代表”的选举中，丑闻百出，大会勉强于1948年3月29日召开，蒋介石被选为“总统”。

“副总统”由李宗仁、孙科、程潜等6人竞选。其中最有力的竞争者即为孙科、李宗仁。经三次选举，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但结果仍然败北，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1948年底，蒋介石在军事内政外交各方面均遇到极大困难，翁文灏内阁倒台，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进行组阁。次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国政。为了摆脱蒋介石所造成的困境，改变颓势，李宗仁力主与中共谈判，妄图划江而治。可是孙科激烈反对，并于1949年2月将行政院迁至广州，对李采取不合作态度。3月



孙科(前坐者)与其女儿、女婿孙穗芳、王守基(左二、左一)、  
长孙孙治平(右)合影

辞行政院长之职，以治病名义去香港休养。1951年孙科赴法就医疗养，从此离开政坛。1952年移居美国，直到1965年10月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时，才应邀回到台湾参加纪念大会。旋被台湾国民党政府聘为“总统府”资政，1966年又被聘为“考试院”院长。1967年8月又被举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会长。1969年春夏之交奉命访韩，接受韩国总统赠给孙中山的“建国功劳勋章”以及赠给他本人

的“一级懋清勋章”和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2月复奉命参加菲律宾的第六届总统就职典礼。1970年3月赴美，参加母校加州大学102年校庆，接受该校颁发的第五届哈斯国际奖，受到隆重的接待。1973年9月13日，因心脏病发在台北逝世，享年83岁。

孙科一生著述颇丰，讲演论著凡250余篇，百余万言，辑成《孙科文集》，共三册，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